



ICSL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2, No. 1, 2026, pp.82-90.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60108metss>



东坡诗文的近代英译：文献、分期及其意义

姚达兑 (Yao Dadui)

摘要:在“西学东渐”同步发生的“中学西传”进程中，东坡诗文的英语译介具有独特的文化史价值。然而，由于资料匮乏，早期研究存在诸多讹误。相关文献主要散见于近代西方传教士、外交人员的论著及当时的英文杂志。对这些文献的重新调查与分析，有助于修正已有的讹误，并厘清东坡诗文在西方的传播脉络，同时为分期研究奠定基础。对东坡诗文英译文献的重新分期，不仅尊重译介史上的关键事件，也为东坡诗文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新视角。作为中国文学的巨匠，东坡的诗文翻译历程折射出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理解，同时展现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关键词: 苏轼（东坡）；中学西传；历史分期；译介史

作者简介: 姚达兑，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电邮：yaodadui@foxmail.com。

Title: The Moder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u Shi's Poetry and Prose: Documents, Periodization, and Significance

Abstract: During the simultaneous process of “Chinese Learning Spreading Westward” alongside the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Eastwar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u Shi's poetry and prose holds uniqu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due to the scarcity of primary sources, early studies contain numerous inaccuracies. Relevant documents are mainly scattered across the writing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diplomats, and contemporary English-language journals. A thorough re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materials can help correct existing misinterpretations, clarify the trajectory of Su Shi's works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a refined periodization of their translation history. The periodization of Su Shi's English translations not only respects key event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but also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study of his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As a literary giant of China, Su Shi's translation journey reflects how Western audiences have received and understood Chinese culture while highlighting the complexities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Keywords: Su Shi's Poetry and Prose; Chinese Learning Spreading Westward;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Translation History

Author Biography: Yao Dadui,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Hain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yaodadui@foxmail.com.

一、前言

中国的近代时段是中西古今交汇的十字路口，是一个思想碰撞、文化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同步进行，展现了全球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与互动性，即便是在近代中西势力严重失衡的背景下，这种中西相互影响依然存在。然而，相较于“西学东渐”已成为百余年来学术研究的显学，“中学西传”，尤其是中国文学和思想的西传，却长期遭到了忽视。在《19 世纪<三国演义>英译文献研究》（2018, p.1）一书中，王燕曾指出，近代“中学西传”的主要译介者和传播者是来华的传教士与外交官，因其身体特殊，他们的译介文献还未得到充分的研究。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往往侧重于国内文献与汉语文学传统，对这些外籍译者及其译介活动关注较少；而外交史与宗教史领域的研究者则更关注政治、外交与宗教传播，未能充分重视他们在中国文学传播与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王燕，2018, p.1）。正因如此，自嘉庆以降，由传教士与外交官用英语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和研究性文献，至今仍罕有人系统地梳理和研究。然而，这些译介者和传播者的诸多文史观念在当时及后续的文学史与文化史编撰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英语译作、论著不仅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重要媒介，同时也在文化理解与跨文化诠释方面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对作品主题的诠释、人物性格的解读，对文学史和文化史关键话题的把握，都影响到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认知。

东坡诗文在英语世界的最初译介，正是发生在近代这一时段，同样也是受关注不够，而且现有的少量研究也出现了不少错讹。故此，有必要撰文重新梳理东坡诗文的近代英语译介文献，对已有的错讹进行考辨，进而对这些发现的文献进行分期，并指出其历史意义。

二、相关研究及其错讹辨析

在此对东坡诗文近现代英译的研究现状作一简要梳理。当代学者中，最早涉及苏轼海外研究的文章，是美国汉学家唐凯琳（Kathleen Tomlonovic, 1941-2019）于 1986 年发表的《海外苏轼研究简介》一文（唐凯琳，1986, pp.51-61）。该文综述了欧美及日本等地的苏轼外文翻译情况，为苏轼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1989 年，唐凯琳在华盛顿大学完成博士论文《诗歌的“贬”与“归”：苏轼研究》，该论文探讨了苏轼诗歌中的贬谪主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Tomlonovic, 1989）。然

而,据笔者调查,该论文并未如学术界或媒体报道所称那样已于 2000 年出版,因此其影响较为有限。

¹1991 年,唐凯琳用中文发表了《宋代文化的代表人物苏轼:美国汉学界近年来研究简介》一文,详尽地介绍了当代美国汉学界关于苏轼的研究进展(唐凯琳,1991, pp.450-456)。除唐凯琳外,饶学刚在 2005 年的研究亦对苏轼的外译情况有一些讨论(饶学刚,2005, pp.52-56)。尽管二人在史料完整性和观点深度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但在推动苏轼在英语世界的学术传播与研究方面确有贡献。然而,唐凯琳主要关注苏轼诗文的当代译介,而饶学刚的研究则聚焦于 1937 年林语堂《苏东坡》出版后欧美学界的相关讨论。因此,两者均未涉及 19 世纪苏轼外译文献的研究。

迄今(2005)为止,涉及东坡诗文英译研究的专著主要有三种,分别是戴玉霞著《苏轼诗词英译对比研究——基于和合翻译理论的视角》(2014)、万焱著《美国汉学家的苏轼研究》(2018)和徐华著《苏轼文学作品的英译与传播》(2023)。笔者长期从事近代英语文献的研究,且近年得益于欧美各大图书馆系统的丰富资源及世界各地师友的慷慨相助,故能全面调查、细致研读戴玉霞、万焱及徐华等人所讨论的所有相关文献。数年来,笔者逐一核查、辨析,力求在史料考证上严谨公正,以确保结论的准确性。

戴玉霞于 2016 年发表的多篇论文及其同年出版的专著《苏轼诗词英译对比研究——基于和合翻译理论的视角》,对苏轼诗词的英译状况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研究的系统化。然而,该梳理仍存在一些史实性错误。戴玉霞曾指出西方最早译介苏轼诗作的是鲁米斯(Loomis, A. W.)——“他曾于 1853 年在伦敦版《皇家亚洲协学会报》(*Journal of RAS*)第 4 期中刊载了翻译苏轼的一首描写家园的诗歌,由于年代久远,诗名无处可考。”(戴玉霞,2016, pp.103-107;徐华,2023, p.227)此说后来徐华等人也沿用。戴玉霞所据为《中国翻译大辞典》,但未注明具体出处。²由于“辞典”性质的权威性,此说误传甚远,在学界被频繁引用。这就导致了鲁米斯被误认为早期东坡译介的重要译者之一。笔者通过一系列的核对考证后发现:1853 年伦敦版《皇家亚洲协学会报》并未刊鲁米斯的任何文章。遍查鲁米斯的论著可知,相关线索应为 1867 年鲁米斯专著中所载的《苏姓诗人的诗作》一诗(Loomis, 1867, p.359)。此诗实际上出自艾约瑟 1855 年在香港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会刊》第 4 期所译诗作,且该诗并非苏轼作品,而是唐代诗人祖咏的诗作《苏氏别业》(Edkins, 1855, pp.51-85)。艾约瑟在译文中误将其归为苏姓诗作,这一错误被鲁米斯沿用,进而影响到一百多年后《中国翻译大辞典》的编者,将该诗误归于苏轼名下。当代学者陈陈相因,一错再错,戴玉霞(2016)、徐华(2023)等学者未能核查原始资料,继续沿用了这种错误观点。

万焱在 2018 年出版的《美国汉学家的苏轼研究》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脉络,深入探讨了美国学界对苏轼诗词、哲学与美学、贬谪心态等方面的研究,重点涉及的美国汉学家包括艾朗诺、刘若愚、孙康宜、包弼德、杨治宜等。然而,徐华在其著《苏轼文学作品的英译与传播》

¹有学者指出该博士论文修订成书,于 2000 年出版为《西方汉学界的苏轼研究》一书。该消息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古史”的文章“西华盛顿大学唐凯琳(1941-2019)女史逝世,致哀!”,请参 <https://mp.weixin.qq.com/s/x5vqS9eLfm-bP9qZaS3rcQ> (访问日期:2023.11.12)。经笔者调查核对,实无此事。该博士论文并未出版成书。

²戴玉霞提及的字典是《中国翻译大辞典》。但是笔者查无此书,推测其可能指的是《中国译学大辞典》(方梦之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年)。

(2023)中指出,万隰该书虽侧重美国苏学研究,但对苏轼作品的翻译层面着墨不多,并未从语言翻译的角度分析相关译作(徐华,2023,p.4)。

万隰的著作为读者呈现了当代美国学界研究苏轼的宏观图景,在整体性和概括性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然而该著在涉及近代史料的部分,作者未能逐一加以核对,因而存在部分史实性的错误。

经过对这些近代英译苏轼诗文的全面搜查、核对和分析,笔者有如下几点发现。(1)万隰在《美国汉学家的苏轼研究》一书中提及,“早在1834年,英国汉学家郭实腊(Karl Gutzlaff, 1803-1851)就开始了苏轼研究,他在1834年出版的《大英国统志》中评论了苏轼诗歌,且从1839年起,就陆续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撰写《苏轼全集》的阐述性文字,虽然其成果不算很突出,但是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第一人。”(万隰,2018,p.33)万隰指出郭实腊1834年《大英国统志》中有对苏轼诗歌的评论,但徐华在核对后已明确指出并无此事。郭实腊所著《大英国统志》实有同书异名的两个版本,该书已由庄钦永于2015年整理校注出版。¹笔者进一步复核后,确认徐华所言属实,《大英国统志》中实无苏轼诗歌的评论。此外,所谓发表于《中国丛报》的文章,经笔者查证,实为郭实腊所撰关于《苏东坡全集》的书评,发表时间为1842年3月,而非1839年(Gutzlaff, 1842)。值得一提的是,在1842年之前,郭实腊已发表多篇有关苏轼诗文的译介文章。因此,可以说郭实腊在其时代对苏轼的译介成就最为突出,是为其时代的第一人,不能简单归为“并不算很突出”。(2)万隰提及的翟理斯的著作《古文珍选》,实为《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Giles, 1884)。笔者曾请求康奈尔大学与哈佛大学图书馆从古书库中调阅两馆所藏的1884年版原著,见到该书封面确有“古文选珍”四字,因其书名四字以篆书印制于鎏金封面的左上角与右下角,故扫描版本难以辨识。网络上流传的多个扫描版有的已无此封面,有的难以识读,但有的仍可见前辈学者另外手写的“古文选珍”四字。有学者依据其英文书名将其译作《中国文学的瑰宝》,此译法略显不妥。因为在近代涉及中国的外文著作中,若著作者已自行拟定了汉语书名(常见于正封面、书脊或内封首页),即便该汉语书名与英文原名并不完全对应(此事经常发生),也应尊重作者的原意,优先采用其自拟的标题。(3)关于李高洁(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 1894-1945)翻译的《东坡赋》版本,万隰在2014年论文中提及为1935年上海版,但在其著作中误改为1945版,实则1935年版为正确版本。该书于1935年版由上海著名出版机构“别发书馆”(Kelly & Walsh)出版,内封由叶恭绰亲题“苏赋”二字,且钱锺书曾为此版作序(Clark, 1935, pp.xiii-xxii)。该书英文书名题为“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万隰将其译为《东坡赋》,也稍有不妥。考虑到初版封面上名家题字“苏赋”,笔者认为更合适的译名应为《英译苏赋》或《英译苏东坡赋》。

近年来,关于东坡英译的最重要著作要数徐华于2023年12月出版的《苏轼文学作品的英译与传播》一书。该书基于作者202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该书的正文共分四章,分别讨论了英美地区苏轼作品的英译(涵盖诗、词、文三类)、在英译文献中塑造的苏轼多重形象(如全才、超脱者、革新者、文化使者等),以及这些英译文献的传播与影响。尽管该书以英美两国的东坡英译文献为主要内容,但其调查范围涵盖了所有英语文献,跨越了200年的历史(从19世纪初到当代)。

¹ 经核对该书第124页,郭实腊小说中有人物口头提及“莫说儒有苏学士之才华……”一句,“苏学士”即指苏轼。全书仅此一句与东坡相关。

作者在材料搜集、文献考证和分析等方面，用力颇勤颇精，研究方法严谨且细致。徐华认为，其书还解决了一个学术公案，即“英译苏轼文学的第一位汉学家是谁”这一问题。徐华指出，首位将苏轼文学翻译成英语的是德籍来华传教士郭实腊，1838年郭实腊所译东坡诗《赠眼医王彦若》为最早英译（徐华，2023, p.15）。此外，徐华还认为，1842年郭实腊关于《苏东坡全集》的书评“对苏轼几乎用尽了一切溢美之词。”（徐华，2023, p.233）这些说法，仍有可修正之处。据笔者调查发现，在郭实腊之前，已有一些译介东坡诗文的英语文献，而且，实际上郭实腊的态度并非如此积极，反而是看轻东坡诗文、贬低中国文学，并对中国文化持有轻蔑之情（姚达兑，2025, p.68）。

东坡诗文的最早英语译介，笔者有如下补正：（1）最早提及东坡的英语文献是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5）。马礼逊在该字典中，“学”字辞条之下，有一段文字论及了中国文章作法，转录了明代学者沈虹台“论文十一要”，第11条下提及东坡论诗有“新诗如弹丸”一句（附有英译）（Morrison 1815, p.785）。马礼逊这部字典是第一部汉英字典，是当时汉学家必备的参考书，影响深远。东坡此句及其大意，出自其诗《次韵答王巩》和《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以屏山赠欧阳叔弼》（曾枣庄、舒大刚，2021, 第1册, p.340, p.461, 第2册, p.622），故而1815年马礼逊所译此句，是为最早东坡诗英译。（2）其次，1828年马礼逊在其著《广东省土话字汇》一书中还译有苏轼诗句——“日食荔枝三百颗，不妨常作岭南人。”（Morrison, 1828, 无页码）（3）东坡文在英语世界的最早英译是1832年4月30日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英译《王者不治夷狄论》的片断（Lindsay, 1833, pp.67-69）。此段在裨治文（1832）和德庇时（1836）等人论著中也曾提及（Bridgman, 1832, p.154; Davis, 1836, pp.66-67）。（3）第一首被完整地译成英文的东坡诗，是1838年郭实腊英译《赠眼医王彦若》一诗（Parker, 1838, p.106）。

三、文献搜集和调查

近代西方人（传教士和外交官为主）关于东坡作品的英语译介，有的收录于独立出版的专著之中，也有的发表在期刊上。有些文章在不同刊物间被转载或引用，有时甚至在刊载或转载时未注明作者姓名。这种情况较大地增加了调查和研究的复杂性，因而要求研究者进行更为细致的文献比对与多层次的考证，以揭示译介文本的来源、流传与影响。笔者得益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的服务，Google Books、Internet Archive、HathiTrust 和 WorldCat 等数据库提供的信息和资源的支持，以及数字工具的有效运用，在东坡诗文英译这一领域的调查，取得了一些进展。

笔者的调查时段为1728-1931年。以1728年为起点，是因为马若瑟在这一年首次将《王者不治夷狄论》的片段译成拉丁文，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东坡诗文西译。以1931年为界点，是因这一年李高洁出版了《苏东坡集选译》，这是东坡诗文的首部译介书籍，标志着东坡诗文在西方译介的成熟。

笔者的调研对象包括两类：一是1728至1872年间在华活动的西方人士的英文著作，主要参考伟列亚力所著的《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并通过全网检索核查书中所列传教士及其著作。1867年后的汉学家，笔者参阅多种汉学史和相关论著，基于长期研究积累，进行大范围的检索调查。此外，笔者还借助当时涉及中国的杂志索引，进一步核查可能的译者，并采用相同方法搜集同期外交人士与汉学家的相关英文著作。其二是1728至1931年间涉及中国的一些代表性的英文杂志，包括 *The Asiatic Journal* (1816-1845, 72卷), *The Canton Register* (1827-1843, 16卷), *Canton Miscellany* (1831, 1卷),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 20卷), *Fraser's Magazine* (1830-1869,

80 卷), *Chinese Miscellany* (1845-1850),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1863-1865, 3 卷), *The Chinese Recorder* (1868-1940),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1867-1870), *The China Review* (1872-1901, 25 卷 150 期),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47-1855) 及其后续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58-1949)[74 卷 109 册], *The Phoenix* (1870-1873, 3 卷) 等。笔者借助对以上提及的人名、著作和杂志, 借助 WorldCat 等数据库和各大学图书馆进行全文检索, 换多种关键词进行多次搜索, 以尽可能确保相关文献的收录。然而, 即便如此谨慎, 此种方法仍可能存在一定的遗漏。

经调查, 笔者发现以下西方学者曾涉足东坡诗文的英译, 其中许多人尚未受到学界充分关注。十九世纪东坡诗文译介中涉及的学者包括马礼逊、裨治文、郭实腊、裨雅各、卫三畏、马儒翰、胡夏米、德庇时、麦都思、麦华佗、巴夏礼、包令、包腊、梅辉立、慕稼谷、约翰·格雷、翟理斯、欧德理、明恩溥、朱尔典等人。¹这些近代汉学家——多为外交官与传教士,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构建了广泛的文化传播与影响网络。正是凭借他们的译介、讨论和传播, 东坡诗文得以在西方世界流传开来。

四、近代东坡英译文献的历史分期

鉴于学界对上述杂志及译介者涉及东坡诗文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 许多相关文献仍处于学术讨论的盲区, 笔者在调查之后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分期。此前, 万焱与徐华亦曾提出历史分期, 然笔者认为其划分方式颇为不妥, 有待进一步修正。

2014 年, 万焱在《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综述》一文中对英语世界苏轼研究进行了分期, 划分为发轫期、发展期与成熟期三个阶段(万焱, 2014, pp.176-188)。万焱指出发轫期始于 1834 年郭实腊在《大英国统志》中对苏轼诗歌的评论, 她未提及结束时间, 但以翟理斯所著 1884 年《古文选珍》、1898 年《古今诗选》与 1901 年《中国文学史》的出版的讨论为止。万焱在其后出版的《美国汉学家的苏轼研究》一书中, 对这一分期作出了修订, 只保留了两期, 将“发轫期”和“发展期”合并, 更名为“滥觞期”, 而“成熟期”更改为“全面发展期”。这种分期较为简略, 而且忽略了近代更多东坡诗文英译和研究的情况。

徐华(2023)将苏轼文学作品在海外的英译和研究情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笔者对其概括和评介如下: (1) 萌芽期(1838-1927)。以 1838 年郭实腊首次英译东坡诗为起点, 标志着东坡诗文的英译正式开始。1927 年被视为终点, 因为 1928 年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被认为是译介史上的重要分水岭。(2) 发展期(1928-1955)。起始于 1928 年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 终止于 1955 年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设立。然而, 徐华并未详细解释为何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可作为东坡英译与研究的分期标准。

(3) 兴盛期(1956-1999)。这一阶段见证了全球汉学研究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 伴随而来的是大量关于苏轼作品的译介与研究成果, 东坡研究在这一时期达到空前的繁荣。(4) 深化期(21 世纪初至今)。进入 21 世纪后, 东坡诗文的译介与研究在视野和深度上相较于前期更加广泛和深入(徐华, 2023, pp.19-21)。

笔者认为, 徐华的分期方式存在一定的简化与不足。在萌芽期的界定上, 他未能充分理解这一阶段的复杂性, 忽略了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例如, 他认为除翟理斯的著作对东坡有较大篇幅

¹ 这些汉学家的译介, 基本上代表了 19 世纪英语世界对东坡诗文的译介。受篇幅所限, 此处未列出其英文姓名及相关文献出处。笔者另撰多篇论文及书稿, 对其译介情况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的译介外,其他翻译成果几乎都是零散的单篇译作,仅存在“一些零星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尽管这一描述在总体上较为准确,但仍有补充空间,如在翟理斯 1884 年出版多篇东坡诗文英译之前,朱尔典已于 1883 年译出多篇东坡书信。此外,在发展期的界定上,徐华以哈佛燕京学社和东亚研究中心的成立作为分期标准。然而,这一划分并不恰当,因为这两个机构既非专门从事苏轼研究,也非专注于中国文学研究,甚至其关注范围超越中国,更侧重亚洲的跨学科与比较研究。20 世纪下半叶正是东坡译介与研究进入兴盛阶段的时期,研究和翻译成果显著增加。而徐华将 21 世纪初至今的阶段界定为“深化期”,并将其与 20 世纪的研究割裂,未免过于简单化。笔者认为,21 世纪的译介与研究应视为东坡外译史“长 20 世纪”的延续,而非出现了标志性转折或超越的阶段,因为前后两者在研究方法、学术脉络和译介成果上呈现出明显的延续性。

鉴于万燚、徐华对近代东坡译介文献的分期存在一定局限,且所涉文献不够详尽,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梳理东坡诗文的英译历程,并阐明分期原则与依据。

东坡诗文的近现代英译可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在时间跨度与译介方式上均呈现出鲜明特色。(1)第一阶段为萌芽期(1728—1842)。始于 1728 年马若瑟的《汉语札记》,止于郭实腊 1842 年对《东坡全集》的书评,历时逾百年,然其关键节点集中于 1815 年马礼逊的译介与 1842 年郭实腊的《苏东坡全集》书评,主要涵盖三十余年。本阶段英译多为零星尝试,主要关注东坡诗文的语言特色,初步引介其文学价值,为后续译介奠定基础。(2)第二阶段为奠基期(1842—1883)。1842 年至 1883 年的四十余年间,东坡诗文的英译逐步由零散尝试向系统化迈进。其中,包腊 1872 年发表的《苏东坡》一文尤为重要,该文不仅译介东坡多篇作品,还深入探讨其生平,并在文化身份与历史地位的评价方面更为客观详尽。这一阶段,东坡诗文英译已在内容深度与广度上取得重要突破,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3)第三阶段为发展期(1883—1931)。1883 年至 1931 年的近五十年间,东坡诗文的英译随着中国文学在西方影响力的扩大而显著发展,译介深度与广度皆有较大的提升。本阶段以 1883 年为关键节点,这是因为这一年朱尔典在其《苏东坡在海南》一文首次译介了数封东坡书信,而完成于 1883 年出版于 1884 年的翟理斯《古文选珍》一书收录了其译 11 篇东坡诗文。这标志着东坡诗文在英语世界的更大规模的传播。本阶段以 1931 年李高洁翻译的《苏东坡集选译》一书出版之前为结束。(4)第四阶段为成熟与多元期(1931 年至今)。1931 年李高洁的译著《苏东坡集选译》是首部整本书籍为译介东坡诗文的英语作品(Clark, 1931)。该书收录了 18 篇东坡诗文,其问世标志着东坡英译进入成熟期。自此,东坡诗文的英译形式日益多元,研究角度亦不断拓展,学界开始关注东坡的文化价值与跨文化接受,进一步推动其国际化进程。综上,东坡诗文的英译历程从零星尝试到系统深入,反映了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轨迹,也印证了跨文化交流中苏轼诗文的恒久价值。

近代以降学者在研究文学时往往以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文化史的分期标准。这种做法虽便于与宏观历史脉络对接,但实则存在一些局限性。诚然,文学史与文化交流史在一定程度上附属于历史学的大范畴,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迁也确实影响着作家及其文学表达和文化再现。然而,文学自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深受思想流变、文体革新、审美范式转换及跨文化交流等内在因素的驱动,同时也极大程度上受到天才作家与卓越学者的决定性贡献所影响。因此,简单地以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的分期依据,忽略了文学自身的连续性与内在逻辑,容易导致文学现象被片面解读,甚至使得作家的文学贡献被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所遮蔽。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在研

读东坡英译文献并对其进行分期时，强调以重要的文学事件与文化交流节点作为分期标准，而非依赖政治事件或简单的世纪或年代的划分。通过这一视角，得以更为精准地展现东坡英译传播的历史轨迹，揭示不同阶段中跨文化理解、翻译策略以及文学接受的演变过程。这种分期方式不仅更符合文学和文化传播自身发展的逻辑，也能更深入地反映文学如何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被理解与再创造。

五、结语

东坡诗文的近代译介在文化史与中西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马礼逊的译介仅涉及部分诗文，而郭实腊在 1838-1842 年间的多篇译介，尤其是 1842 年《苏东坡全集》的书评，不仅关注诗人东坡，还将其形象抽象化，赋予其象征整个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东坡诗文英译史上，19 世纪的译介经历了萌芽、奠基、发展和成熟四个阶段，这一过程本身即是一种重新理解的历程，充满了误读、附会乃至文化重塑。对这一时期译介史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性，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西方世界如何构建“中国形象”的认知。

对东坡诗文的近代英译文献的讨论，长期以来因原始资料的匮乏而存在诸多讹误。因此，有必要通过系统地文献调查，重新梳理东坡诗文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轨迹，并根据其性质与影响力，对译介史进行更精细的分期，以更准确地呈现其演变过程与关键转折点。笔者认为，各个阶段皆具有鲜明特征：萌芽期以零星译介和郭实腊的误读为主，奠基期则体现出包腊对东坡较为公正的评价，发展期译介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而成熟期则以李高洁 1931 年《苏东坡集选译》的出版为标志，随后东坡诗文的英译迈向更加多元且持续发展的阶段。这样的重新分期不仅尊重译介史中的重要事件与文化史的关键节点，也为东坡诗文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东坡作为中国文学的巨匠，其诗文的翻译历程不仅映射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理解，也展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课题“东坡在英语世界的译介（1872 年前）”（项目编号：HNSK（ZDZX）24-21）的阶段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Yao Dadui ^{ID} <https://orcid.org/0000-0001-5366-6170>

References

- 戴玉霞（2016）：《苏轼诗词英译对比研究——基于和合翻译理论的视角》。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 [Dai Yuxia (2016).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u Shi'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mony Translation Theory*. Xidian University Press.]
- 戴玉霞（2016）：“苏轼诗词在西方的英译与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03）：103-107。
- [Dai Yuxia (2016).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Su Shi's Poetry in the West." *Journal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03): 103-107.]
- 饶学刚（2005）：“苏东坡在国外”，《黄冈师范学院学报》（02）：52-56。
- [Rao Xuegang (2005). "Su Dongpo Abroad." *Journal of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02): 52-5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8078.2005.02.012>]
- 唐凯琳（1986）：“海外苏轼研究简介”，《黄冈师专学报》（04）：51-61。

- [Tang Kailin (1986). "An Introduction to Overseas Research on Su Shi." *Journal of Huanggang Teachers College* (04): 51-61.]
- 唐凯琳 (1991): "宋代文化的代表人物苏轼: 美国汉学界近年来研究简介"。载《国际宋代讨论会论文集》: (450-456 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 [Tang Kailin (1991). "Su Shi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Song Dynasty Culture: Recent Studies in American Sinology."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ng Dynasty Studies* (pp. 450-456),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万隼 (2014): "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综述", 《国际汉学》(02): 176-188。
- [Wan Yi (2014). "A Survey of Su Shi Studie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nternational Sinology* (02): 176-188.]
- 万隼 (2018): 《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Wan Yi (2018). *Su Shi Studies in American Sinolog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王燕 (2018): 《19 世纪〈三国演义〉英译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Wang Yan (2018). *Studies o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徐华 (2023): 《苏轼文学作品的英译与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Xu Hua (2023).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u Shi's Literary Works*.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姚达兑 (2025): "近代英语文献中的东坡",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03): 68-77。
- [Yao Dadui (2025). "Dongpo in Modern English-language Sources."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03): 68-77.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962.2025.03.007>]
- 曾枣庄、舒大刚 (2021): 《苏东坡全集》。中华书局。
- [Zeng Zaozhuang & Shu Dagang (2021). *Complete Works of Su Dongpo*.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庄钦永 (2015): 《“无上”文明古国——郭实腊笔下的大英》。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
- [Zhuang Qinyong (2015). *The "Supreme" Civilized Ancient Nation: Britain in the Writings of Karl Gützlaff*. Singapore Bafang Culture.]
- Anon. (E. C. Bridgman) (1832). "Literary notic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Chinese Repository* (04): 152-155.
- Clark, C. D. L. G. (1931). *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Su Tung-p'o*. Jonathan Cape.
- Clark, C. D. L. G. (1935).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 Kelley & Walsh.
- Davis, J. F. (1836). *The Chinese* (Vol. 1). Charles Knight.
- Edkins, J. (1855). "On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04): 51-85.
- Giles, H. (1884).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Privately printed).
- Gützlaff, C. (1842). "Notices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Sú Tungpo." *The Chinese Repository* (03): 132-141.
- Lindsay, H. H. (1833).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 B. Fellowes.
- Loomis, A. W. (1867). *Confucius and Chinese classics*. A. Roman & Co.
- Morrison, R. (1815).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1, Vol. 1). Macau East India Company Press.
- Morrison, R. (1828).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acau East India Company Press.
- Parker, P. (1838).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 The eighth report includ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1st to June 30t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02): 82-106.